

中以关系地缘政治分析

作者：本雅明·汀·阿尔瓦雷斯(Binyamin Tjong-Alvares)，写此文时任 SIGNAL (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 执行董事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 2015 级翻译硕士俞晨飞 沈雨秋 吕鑫 姜洋 李军 董寒冰 冯诗 茵张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于 1949 年 10 月，仅仅比以色列建国晚 11 个月。尽管中国和以色列处在亚洲相反的两端，两国同样在建国时社会都十分落后并以农业为主，在成立初期，两国都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诸如领土威胁等等。然而，中国与以色列在地理上的相隔距离，它们与欧洲和西方国家的相望，同时还有他们之前因决定性的殖民势力而对他们世界观产生的对比的经历，使这两个国家几十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中国与以色列在很多地方都有共同之处，然而美国却阻碍了这两个古老国家关系的自然发展，并且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今，中国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比以往受美国的影响更小，这两个国家最终已经准备好通过两个国家更深更广程度上的交流去协同发掘更丰富的资源，并实现将福利传递到世界上更广的地区共同目标。

历史背景

中以之间的联系紧随第二次世界大战展开而来，这比两国中任意一国正式建立的时间都要早。早在 1918 年的 12 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陈路同志表示了对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支持，并且强调了国民党对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明确的积极态度。1920 年四月份，中华民国国父兼第一任总统——孙中山先生，写了一封信，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重新定居。孙中山先生写信给以利亚·卡杜里(ElieKadoorie)所领导的上海犹太复

国主义者，在信中说：“所有热爱民主的人士都情不自禁地支持这一行动，从而使你们美好而历史悠久的民族稳固下来，这能够对世界的文明做出巨大的贡献，并且赢得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

在以色列主要建国官员的第一个任期内和戴维·本·古里安 (David Ben-Gurion, 1948.3.17—1954.1.26)任首位总理期间，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发展得十分兴盛。作为总理，本·古里安主张在希伯来大学设立汉语院系。本·古里安与缅甸首位总理吴努，同样也是以为坚定的以色列支持者，他们的关系十分密切，这加强了以色列和亚洲，最后是同中国的联系。

事实上，以色列是在 1950 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然而，两个国家选择达成友好关系真实地表明两个国家早期历史上建立直接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联和早前为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建立联盟关系，并且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同时，以色列同那些承诺维护其安全的国家发展密切的关系，这些国家是早前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和美国，这些国家在之前的一个世纪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以色列需要发展它的防御工业以抵御来自其敌对邻国的威胁，其中很多的敌对邻国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盟国，这就为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重新唤醒中以两国关系创造了条件。20 世纪 70 年代末，绍尔·艾森伯格 (Shaul Eisenberg)，以色列最大的控股公司——以色列股份公司的建设者，在为推动以色列成为全球防御工业的出口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成了中国和以色列的武器交易。其他的公司也很快地加入到其中。每个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实际必备品使得日益兴盛的以色列和中国互相阐明立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从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演化过来的，重点放在了以国际制造和国际贸易为形式的实质性的经济发展。在国际制造和国际贸易方面，以色列走在了先进技术的前列。

隔离与同化的碰撞

尽管中国在千年的发展中有过被压迫的历史，但中国人从来没有在祖先的土地流亡过。中国受压迫的形式是投降，而不是流亡。在近代史上，中国遭受了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侵略。对于中国人来说，鸦片战争（1839-1842，1856-1860）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以中国的投降和随后的社会状况为其特点的所谓的“世纪之耻”，使中国对于国家的意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方面，犹太人民在现代的以色列国建立之前的约 1900 年都被流放到他们祖先的居住地以外。在强制推行的流放之下，处于大流散之中的犹太人民开始学会与在罗马帝国，同样摧毁了犹太人民家园，在它的统治之外发展起来的欧洲国家进行交融。这种同化，虽然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种困境，但也使犹太人民有能力去理解外国的社会和文化，这和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的方式。而且，犹太人祖先的居住地与欧洲文明的摇篮相距很近，并且欧洲最早诞生的宗教在犹太的起源——基督教，形成了以色列与欧洲和西方国家共同语言的基础，而这一点中国是没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对西方国家殖民趋势的反应使得中国对于欧洲的不信任极度深化，并且延伸到对美国的不信任。在 20 世纪世界秩序和从中国所追求的盟友角度看，这种持续的谨慎严重影响了中国在将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所实行的外交政策。例如，中国虽然与苏联在 1949 年达成同盟，但是考虑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中国对苏联在其领土方面的侵占保持着警惕性，为了能够平衡苏联的力量，中国最终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美国建交。

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寻求能够获得帮助的一切来源，因为他们为使他们祖先的居住地得到历史性的回归。事实上，犹太历史上的敌人成为了它最坚实的盟友。

冷战对峙

年轻的以色列国最初寻求保持不结盟的政策，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建立广阔的盟友网络。

然而 1950 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了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方向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令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 忧虑的是如果朝鲜袭击问题没有解决,未来可能要开创向以色列发起挑衅行动的先例。因此,以色列国很快地就表示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战争的干预和联合国保护任何一个国家都免受侵略的角色。此外,以色列的领导者认为支持美国的努力是一种义务,尤其是美国的犹太人群体对建立以色列国的支持方面。

以色列发现它强制抛弃非认同化的政策,使自身和美国、联合国在冷战对抗期间达成同盟。以色列的官员支持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而不是不结盟政策,因为他们相信以色列在那个年代要想生存就必须得取决于西方国家的帮助。而中国却恰恰相反,它把西方国家的权力当成是对其主权的潜在威胁,同时担心美国会在其侵略朝鲜重恭候立即侵入中国的边界。

冷战使世界划分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美国对阻止“羽翼未丰”的社会主义犹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有任何的进展有着极大的兴趣。中国与以色列在赫尔辛基由了第一次的联系,之后中国政府郑重地邀请了以色列在中国建立大使馆。大卫·哈科恩(David Hacohen),以色列的政治家,在 1953 年至 1955 年间作为派往缅甸的以色列特使,于 1953 年同中国特使 Yao Chunming 会面,并确认中国同缅甸在增进外交和贸易关系方面的兴趣。在时任缅甸总理吴努的热烈支持下,哈科恩于 1954 年在缅甸的首都会见了中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先生。周恩来先生告知人民代表大会,称中国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正在进行,哈科恩开始计划在北京建立以色列大使馆。

这种发展情况引起了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警惕,他对社会主义国家并不认可,并且对犹太国家施加压力,让其放弃与中国计划要建立的外交关系。考虑到以色列对美国呈半依附状态,所以这种传递给中国明显的信息并且始终以发展起来的关系变得冷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领导人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与更多的曾遭受欧洲帝国主义压制的国家并与之结成同盟。尽管以色列是中东第一个承

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但由于犹太国家并没有使其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因此中国转而同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5年4月，在新德里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对以色列重新接纳在1948年独立战争中逃离的难民这项决议进行了投票。中以关系历史性的时刻后来出现在了同样于1955年召开的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Bandung Conference)上。

1955年的万隆会议某种程度上是由亚洲穆斯林国家发起的，这次会议把新独立的亚非国家聚在一起，目的是形成一个既不依附西方也不依附苏联的同盟体。万隆会议的目标之一就是表示与会国家对西方霸权、及其在有关亚洲的重大事务中将亚洲国家排除在外的不满。新中国迫切想要在第三世界的国家中确立主导地位，因此需要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然而在众多受邀的阿拉伯国家中，却没有以色列的名字。万隆会议之前，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没有交集，因为这些国家此前都是支持台湾的。

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在万隆会议上达成一致，共同反对美国霸权，并形成了强烈的反帝国主义共识，开辟了双边友好往来的新道路，并最终反映在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各项举措的支持上，其中就包括对以色列的联合抵制。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与时任埃及总统纳赛尔 (Gamal Abdel Nasser) 会面时，后者向他介绍了以色列想在中东成立为一个犹太国家而阿拉伯世界极力反对这一情况。前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侯赛尼 (Haj Amin al-Hosseini) 也位列万隆会议的贵宾，他曾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与纳粹德国合作，煽动针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暴动。在法塔赫(Fatah)铁腕人物哈拉夫 (Salah MesbahKhalaf，也称阿布伊亚德(Abu lyad)，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巴解组织) 二号人物、情报部门负责人) 看来，中国就是从万隆会议开始，向巴勒斯坦伸出了援手。后来成为巴解组织第一位领导人的艾哈迈德 (Ahmad al-Shukeiri) 也参与了纳赛尔和周恩来的会面。西方国家关注约旦河西岸很久之前，后来为约旦占领之时，巴解组织成立之后，中国就开始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兴趣，并最终开始为巴解组织提供武器。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盟友越来越多，但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因为 1945 年以来，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所占据。国民政府当时是二战同盟国中的“四巨头”之一，也和苏联、英国、美国共同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考虑到中国的盟友关系，美国总统罗斯福(Roosevelt)公开对中国在二战中所做的贡献表示认可，并希望中国可以在“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尽管其他国家反对，美国还是帮助中华民国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 年，共产党政府上台执政并在中国大陆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岛，继续保留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并作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唯一合法政府。

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许多社会主义盟国及其它国家都向中国伸出友谊之手，这些国家由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牵头，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决议，反对蒋介石政府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出席，要求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出任联合国的席位。年复一年，美国试图阻止社会主义国家再次获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拉来多数票阻止这一决议生效。但在 19 世纪 60 年代，随着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陆续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由完全西方主导转变为由同情中国境遇的国家主导。

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倾向于投弃权票，但在 1965 年，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招入了一名原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外事事务官，莫迪凯·阿贝尔(Mordechai Arbell)。正是这个人，改变了以色列对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和立场。

阿贝尔表示：“每次进行投票，形势都会更有力于中国一些，最终双方票数咬得很紧，只一票即可让局势完全反转。”阿贝尔补充说，这使以色列在联合国的代表团有机会向北京传递清楚的信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已经接受艾哈迈德·舒凯里，作为 1964 到 1967 年巴解组织在第一任领导人。因此，阿贝尔认为，这是一个以色列向中国表达不满的好机会。阿贝尔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知道以色列的政策是投弃权票，因此他们知道如果会见那样一

位恐怖分子，我们就会反击。我们不会弃权。我们将会投票。”阿贝尔在那时只是个年轻的外交家，同时也是唯一同意为台湾投票的人。以色列代表团告知以色列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除了阿贝尔所有人都同意投弃权票。梅厄部长随即下令采取阿贝尔的意见。阿贝尔说：“投票已经按国家的字母顺序开始进行，有人叫我跑到台湾代表团那里告知以色列的决定。而当我告知他们的时候，他们激动的对我说：‘你们救了我们一命’。”

在投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以色列政府的仇视程度越发激烈，因此北京方面加紧了对巴解组织的支持力度。在 1965 年与巴解组织代表团会面时的演讲上，毛泽东主席将台湾与以色列比喻为西方用来牵制别国的棋子，并将以色列描述为阿拉伯世界可以用来对抗西方的靶子。毛泽东主题同样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很惧怕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台湾是帝国主义在亚洲有所作为的根基。帝国主义为阿拉伯国家创造了以色列问题，并为中国制造了台湾问题。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于此同时，以色列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中华民国的投票也使这一犹太国家获得了新的盟友。阿贝尔被盛情邀请到台北（多年后最终被派驻韩国）发展中华民国与以色列的非外交关系。鉴于蒋介石与约旦国王侯赛因关系紧密，台湾政府并不愿意与以色列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尽管两国关系紧密，但由于侯赛因国王的祖父在耶路撒冷被杀害，台湾提出建立非外交性、非正式关系。这使以色列政府尚有机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关系，即使是低水平的关系。

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间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71 年 10 月 25 日的联合国大会上，第 2798 号决议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通过。决议撤销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中国民国不仅失去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同时也不能在联合国的任何机构派驻代表。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中国对西方比以前更为开放。在 1969 年中国与苏联年进行了战争，

中国开始视苏联为比美国更具威胁性的霸权力量，威胁着其国家安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渐渐开始与美国走得更近。随着中苏两国间在 1969 年发生边界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美国是平衡苏联威胁的有效力量，同时美国视中国为潜在盟友，能够抵抗苏联来促使世界力量再平衡。从 1971 年开始，两国开始慢慢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Kissinger)致力于发展全球力量平衡的政治政策，在中美两国建交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的反社会主义情绪迫使以色列与中国关系一度断交，虽然这股反社会主义浪潮渐渐褪去，但中以两国间花了 20 多年来调解两国的政治分歧。

香港--中以外交关系建立之门

1961 年至 1985 年，以色列在香港地区名誉理事，维克多齐任斯奇(Victor Zirinsky)，犹太社会备受尊敬的一位先生，前几年刚从上海搬居香港。1973 年，以色列驻香港领事馆开始在港运行，当时的总领事是伊曼纽尔加尔巴 (Emanuel Gal Bar)，受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及外交部支持阿拉伯态度影响，中国几乎不可能将支持以色列。两年后，受种种挫折以及国内经济不景气影响，以色列领事馆被迫关闭。

1984 年，中英开始交涉将香港归还中国时，以色列第二次与中国交往的机会来了。仔细阅读声明后，以色列外交部强调了中英归还香港联合声明附录 1 第 11 条。条约写道:香港境内所有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官方代表,在 1997 年以前仍允许留存，1997 年后均以各国官方使团名义存在。

依据此项说明，以色列外交部事务处的高级副主任哈南·巴昂 (Hanan Bar-On) 和总干事戴维德·凯姆治 (David Kimchi) 说服外交官员伊扎克·沙米尔 (Yitzhak Shamir) 在 1984 年末重新开启驻香港的领事馆。鲁文·梅尔哈夫先生 (Reuven Merhav) 作为一个老道经验丰富的外交家，被任命通过香港探索各种方式以促进以色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梅尔哈夫在 1985 年五月到六月期间历时五周的旅行后，坚定地认为香港的的确确可以作为

一个以色列同中国建交的外交跳板。同时，他意识到两国建交的过程需要同中国的期待相匹配。推动两国建交的唯一有效率的方式需要耐心，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尊重。梅尔哈夫这位已经被任命为以色列驻香港的外交领事，将会最终成为以色列驻中国的外交大使。

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迈出的第一步是进行两国间的学术交流。梅尔哈夫为以色列学生在香港求学开设了教育项目。接着，1985年12月，在以色列努力同中国建交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员付学文在访问开罗期间做出官方声明，他申明只要以色列继续坚持不放弃追求其咄咄逼人野心勃勃的政治追求，中国就绝不会同以色列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他也提到中国会对以色列官方和以色列人民进行区别对待，特别强调中国欢迎学术人士和有关专家以个人名义通过国际组织来中国出席相关会议。这点使得两国间学术交流以及派出留学生在法律上立即得到了法律保障，此举使得中国对以色列人民打开国门，并最终加强巩固了两国之间的关系。第一批来到中国的以色列科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他们给驻香港的外交家们带来有关当时中国现状的准确的一手的资讯。此外，他们也同样扮演着以色列驻中国的“外交大使”角色。

以色列科学家们在中国举办的不同的国际会议上的付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其他来自美国的犹太裔科学家们的卓越表现，都令中国对犹太人的才智赞叹不已，事实上，中国并不总是能将以色列科学家和来自美国的犹太裔科学家严格区分开的。与此同时，中国不断吃惊于以色列取得的科学成果。国家科学学院会副主席约克书·尤提那教授(Yehoshua Yortner)以非官方正式身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围绕着为国家发展进行科技的战略性调整而进行。尤提那教授同中国科学部部长建立起了私人联系并且得到了来自中方的支持，允许以色列科学家可以自由地参与这些类似的学术会议。然而就政策方面而言，两国建交的发展则显得较为缓慢。外交大使梅尔哈夫同中国的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副社长结交认识，而这位新华社副社长同样也是负责中国与其他没有正式建交的国家之间的通讯交流，这些没有

与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里除了以色列还有韩国，南非。李周文梅尔哈夫两人之间私下里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最后李周文向北京提出申请希望北京方面能够批准同梅尔哈夫先生进行一次官方的会面。在 1987 年 6 月，李周文与梅尔哈夫进行了接触，这是中以两国间第一次正式的官方会面。与此几乎同时进行的是，时任外交事务部总干事亚伯拉罕·塔米尔(Avraham Tamir)与中国驻美大使李露月在纽约进行了会谈。在李周文于 1988 年结束了驻香港的任期满后，梅尔哈夫大使与李的继任者继续保持着良好关系，并且这样的关系延续到了梅尔哈夫之后的以色列驻香港大使约尔萨(Yoel Sar)。

结束了在香港的任期满后，梅尔哈夫在 1988 年 9 月再到中国继续完成他未了的使命。那段日子深深地打上了哈莎娜 5753 的烙印，所以他打电话给以色列外交部长皮尔斯(Peres)，祝他新年快乐，皮尔斯接到这通来自北京的电话后，心情万分激动，可能这是中以关系发展历程中官方上的第一次。

梅尔哈夫决定将注意力放在科学，技术和农业方面，因为中国方面曾对这些领域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在梅尔哈夫看来，通过这种途径，两国之间的沟通交流将最大可能的收获成效。在北京，梅尔哈夫也与他之前交往的在科学，航空技术和旅游产业香港朋友联系。在离开北京之际，梅尔哈夫来函洽谈，函件中表达了中国科学学术委员会想要进一步加深其同以色列的关系。在梅尔哈夫曾经在香港苦心经营的交际基础上，他也与中国旅游公司协定了一个协议，承诺以色列的旅行团可以凭借以色列护照在中国旅游，而这些在此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这些协定以及 1989 夏天中国非官方代表团访问以色列的影响下，中国设立了一个旅游办公室，将这个办公室作为一个先头派遣机构，通过这个机构两国可以逐渐将彼此关系正常化。中国旅游公司最终为中国在以色列树立外交形象发挥了核心作用。

持续不断的中国与以色列的交流通过学术交流通道，最终收获了硕果。1989 年，由科学家组成的两支代表团在外交官露丝·卡汉诺(Ruth Kahanov,)的陪同下访问了中国。露

丝·卡汉诺曾经在香港学习过，在领事馆工作过，并且在后期成为外交部部长。这次访问结束之后，在 1990 年二月致力于发展学术交流的以色列办公室成立了，这对于以色列未来在中国的外交代言发挥了核心作用。领事的，经济的和文化方面的事务逐渐进入该办公室的办公范围。

在 COPECO 的基础上，中以两国开启了经济合作。COPECO 是一个同政府合作的公司，1986 在梅尔哈夫和波霍里莱斯 (S. Pohoryles) 教授的倡导下成立，与中国主要负责推动中以经济关系的华泰公司共同发展。这个想法无论是在目标设定上还是结构组成方面都追随着中国模式。最终，COPECO 完全并入学术任务之中。尽管这个在官方层面上专注于农业和科学，但它的确为日后外交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90 年秋天，梅尔哈夫向中国驻美国的外交大使李璐业提出建议以色列的学术代表团希望有一个政治顾问陪同他们来中国。中国随后接受了这一要求，梅尔哈夫任命则夫·斯科特(ZeevSufott)，这位曾经驻荷兰的外交官担当此重任。倘若一切都是按照计划发展的，那么斯科特将有可能成为以色列驻中国的第一位外交大使，对此大家都心知肚明。在之后的梅尔哈夫访问北京，斯科特被正式介绍给以色列在中国的所有相关职能部门，这是他在成为以色列驻华外交大使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

中国决策-精英制定

在两国各自建国二十年以来，中国和以色列两国经历接连不断的冲突，这些冲突对于两国制定国内政策和外交策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色列在 1948 年，1967 年和 1973 年都经历赤裸裸的屠杀，中国则遭受到了威胁其自身主权和统一的国内国外的压力。在 1949 年解放战争以后，中国在其发起的国内动荡中挣扎着，这其中就包含有 1956 年的百花运动，1958 年至 1961 年的大跃进，1966 年至 1976 年十年文化大革命。在这些毁灭性的全国化运动中，

中国还积极参与到与其邻国的军事冲突中去，这反映出其理想化立场，那就是它没有直接面对被视作是亚洲帝国主义的威胁。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台湾海峡危机(1954-1955 ， 1958)，中缅边境战争 (1956)，中印战争 (1962)，中苏边境冲突 (1969) 和中越战争 (1979-1980)，这些战争都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将领土主权置于优先关注的范围，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国领导人对于外国势力入侵的担心。

面对战争中的损失以及从这些战争中的获得的利益，中国领导层却并没有在意，而是继续执着追求其指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8-1962)”，这期间就兴起了“大跃进”运动，并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1958 至 1961 年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 1500 万至 4500 万人死亡，而这样的沉重结果大半要归咎于“大跃进”中的那些大量机构性和政策性的变化。最终，这些令中国领导层关注思考该如何养活全国这 10 亿人，这相当于毛泽东领导时期全国人口数的两倍。

中国辽阔的国土面积，需要中国能够有一个大型的管理机制作为其固有的管理系统中的一部分，而其原有的政府管理系统自古以来就是被精心计划引导着并由学术精英操控着。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历史时期除外，回顾中国自隋朝 (公元 605 年) 时实行科举制以来，学术始终在中国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科举制度是近代考试制度选举公务员的前身，它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术界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以及它与领导能力之间的关系。然而，中国领导人总体上不听从或者不遵守国际领导人发出的警告，相反他们重视国内学科领头人提供的重要信息和分析来做出决策。共识决策法是中国管理体制的一部分，对制定官方外交政策所牵涉的各方参与者都会产生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是外交政策结构的核心，但握有最终决策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执政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共产党机构，政府机构和人民解放军部门共同形成中国外交政策思想和行动。尽管外交部是中国政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但它仅是

外交政策制定的其中一个推动者，显然它不是最重要的机构。人民解放军已经重新成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因为人民解放军官员公开就外交政策进行争论以及通过展示武力而触怒周边国家和美国。研究机构由中国顶尖的学者组成，他们建言献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重大的影响。尽管，不断有许多其他处于传统权利结构边缘参与者加入，如资源公司、金融机构、媒体，但学术界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杰出顾问团体其地位仍未撼动。

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研究机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CICIR）研究院。它是中国最庞大历史最悠久的民间国际研究机构。CICIR 隶属中国国家安全部（MSS）并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监督。据信，CICIR 可以追溯到中国内战和中日战争（1937-1945）时期的情报活动。CICIR 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动荡年间，唯一一所没有关闭的国际关系研究院或大学。1980 年，在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CICIR 被指定为“公开”机构并授权与外国人打交道，旨在搜集情报。中国政府下属的所有研究机构当中，CICIR 是最杰出的一个顾问机构，它定期就政策和问题提供报告和意见，也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供情报。CICIR 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决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部分原因是其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外事办和中国国家安全部在组织方面关系紧密。

另一个重要的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CASS 建立于 1977 年，旨在促进社会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被完全摧毁。《外交政策》称 CASS 为亚洲顶级智库，其直接接受中国国务院领导，是最重要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机构，同时也是国家综合研究的中心。CASS 的部分基本任务是推动研究并根据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承担和完成主要的国家研究项目。除此之外，CASS 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提交重要研究论文和政策意见。

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经济脆弱不堪，之后中苏边境战争爆发，考虑到这些情况，中国决定实施灵活的外交政策，于是 1978 年中国实施新的对外开放政策。这项政策

是邓小平新体制的一部分，这些制度倡导发挥市场作用，带有资本主义倾向，从此，中国经济开始走上转型之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开始摒弃基于意识形态的地缘战略关系。相反，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务实基础上打造双边关系，旨在促进国内增长来首先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中国不再将自己视为地大物博的天朝上国，再一次开放沿海地区进行国际贸易，同时也谨防外国的影响，密切关注自己的贸易和发展。

为了快速发展经济创造就业，中国需要确保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供应。在之后的三十年，中国在阿拉伯地区投资了几十亿美元。中东和北非国家现在赞助中国国有企业实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且成为中国货物的主要进口商。这些国家成为了中国的最大石油来源。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国几十年前前所未有的发展使中国实现了长足进步。由于大多数工厂位于沿海地区，内陆农民纷纷前往资源丰富的沿海城市寻找工作。除此之外，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环境破坏，这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需要解决空前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问题，这一点最终促进了中以关系的加深。中以在中国正需要以色列的高水平的技术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以色列发展高水平技术是为了抵御那些曾经与中国结盟的国家。

中以军事贸易

1975年，中以便于在巴黎航空展开始恢复外交关系，那时，中国一个外交使团参观了以色列展览馆，随后，以色列国防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秘密的军事交往。自从中国把以色列确认为能帮助本国实现经济和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后，中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77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历史性地拜访以色列也使得中国这一区域性外交政策调整合法性得以加强。

中国开始进口以色列各行业先进技术,包括农业、太阳能、电子以及建筑等领域。然而,中国政府却从不公开提及这些贸易往来,因为担心此举会影响中国在美国眼里对中东地区的中立立场。在此后的五年里,中以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这一过程于1987年在联合国开始,并于1992年中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至此,中以贸易额骤然上升。

2000年初,美国强迫以色列放弃了两单重要的军事交易,军事技术是以色列重要出口产品。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军火比其他国家出口到中国的总额还多,而以色列却是中国第二大军事航空技术进口国。相比较而言,尽管以色列总出口占世界市场比重似乎不怎么大,但其技术出口却具有重要意义。当西方国家全力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以色列却同意将自己的费尔康机载预警控制(AEW&C)平台卖给中国。当时,一些防御专家认为费尔康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载预警控制平台。中国军事决策者知道要想成功与台湾或与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干涉抗衡,必须控制台湾海峡领空权。海湾战争以后,中国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PLAAF)与美国空军存在的巨大差距。AEW&C则可给中国在台湾海峡与美空军军事对峙提供重要支持。与此同时,以色列也将为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提供武器支持视作难得的机会,来发展以国内规模仍然很小,但产能却不小的本土军防工业。

苏联解体后,美国不再需要用中国来牵制俄罗斯,但却突然发现,越发强大的中国渐渐成为其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威胁。因此,美国认为以色列不断售卖军火给中国给它在该区域的利益造成直接威胁。这有损美国对以色列的好意。由于以色列愿与中国——美国潜在的军事对手进行贸易往来,其他中东国家转而将此举引发的公众不满视作是美国在该地区主要联盟支持率受影响的标志。

2000年和2005年,以色列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解除了与中国签订的军事装备销售维护合约。2000年6月,美国的压力中止了一项已签订的合约,其中中国已经付款购买以色列费尔康侦察机机载追踪系统,合约价值高达10亿美元。此后,2004年,美国阻止以色列

列返还中国在以色列修理的哈比 (Harpy) 无人机。美国此前未阻止 20 世纪 90 年代就哈比无人机签订的中以协定 , 哈比无人机与费尔康一样 , 都未搭载美国技术 ; 美国最初接受 2003 年以色列应中国的要求 , 更新哈比的“配件库存”。

截至 2004 年 12 月 , 据报道美国开始相信哈比部件运往以色列的目的不是“配件更换和定期检查” , 而是升级换代。他们怀疑所谓的升级可能包括售往台湾的哈比机型高端技术和感应设备。据报道 , 美国国防部认为美以技术结果可能泄露给中国。以色列迫于美国压力 , 撕毁两项长期协议的结果是 , 中以关系急剧下滑。埃胡德·巴拉克 (Ehud Barak) 总理曾经承诺 , 中国将得到费尔康技术 , 致使江泽民主席公开阐述了这一影响。江主席因承诺作罢而失了面子 , 因而给中以外交关系造成了巨大裂痕。这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情况不同 , 当时以色列屈从于美国的压力 , 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的意图有所减退 , 但是这样冷淡的关系只是暂时的。

“中以关系的背景下 , 美国的角色很重要 , 但不是决定性的 ,”中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及副主任叶海林教授告诉作者。“中以都致力于推进伙伴关系 , 这种发展是美国不愿全力支持的。美国可以试图减缓中以关系的发展 , 但是不能将其完全停止。就好像一块砖头 , 可以尝试组织合作 , 但是影响有限 ;”他说。

中以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部分 , 尤其考虑到以色列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和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地位方面。自从 1992 年中以建交以来 , 两国关系稳步推进。

“两国领导人交互访问 , 25 名中国官员和 34 名部长以上级官员出访以色列 ,”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齐前进告诉作者。“两国间的交流互访有助于两国在广泛问题上保持深度坦诚的沟通与交流 , 这也有利于两国通过加强合作、深入协作来增进理解、提高互信。”

然而 , 中以关系中不可忽视美国因素。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不时影响着中以关系的发展 , 然而中美关系却不会对中以关系造成任何影响。

“正如西蒙·佩雷斯 (Shimon Peres) 总统曾跟我说的，以色列是个小国，这就使它与美国的关系需要率先考虑安全因素——以色列只是不能承受美以关系破坏的后果，”中国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及高级研究员李国富博士告诉作者。

“尽管中以建立了外交关系、以色列也努力与中国进一步发展更密切的双边关系，但以色列对美国的依赖始终是一大影响因素。问题是以色列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忽视这种影响，这将直接决定中以双边关系的前景。”李国富博士说。“以方若对此有所作为，中以合作类型和合作水平就会大幅推进。”

“对中国而言，美国是一个在很多重要领域都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但是中国并不是美国的盟友，而且美国有时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中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杨光博士在接受 SIGNAL 采访时说；SIGNAL 是新成立的致力于通过高层学术交流推进中以关系的非政府组织。“虽然中国无意竞争，但是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而且采取措施压制中国的崛起。美国不希望以色列帮助中国崛起。”

“美国对中以合作的主要担心在于，若以色列把高端技术和专业技能转交给中国，中国的军力将得到提升。”叶海林博士说。

“阿拉伯之春”带来机遇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为确保中国能获得当地自然资源来支持本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国大幅增加了在中东和非洲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接下来的十年，由于中国似乎未受到 9-11 袭击后伊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影响，其在中东投资力度加大。从中东石油进口量增加，中国国企另外派遣建筑队到中东各个国家。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中国风险暴露的范围才体现出来。不可预见的发展态势完全令中国政府和执政党猝不及防。

中国政府震惊地发现，撤离时约 36000 中国公民在利比亚工作。随着卡扎菲(Gaddafi)

的下台，中国前期的投资遭受了约 200 亿美元的损失。虽然在叙利亚的财产只是这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经济上的损失敲响了意识上的警钟，彻底意识到缺少对中东的准确认识。尽管中国经济发展与依仗地区局势以及其在水世界经济中的整体实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仍采取传统的不干涉政策。“我们将阻止联合国介入叙利亚事件，”叶海林博士说。“从中国的立场来看，我们应该帮助避免发生另一个利比亚事件。军事干涉对伊朗、巴基斯坦和利比亚都没有什么好处。”

随着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共产党的政策层面意识到石油供给风险。显然，中东突然的动荡直接威胁了中国的能源安全。相应的，中央政府鼓励国有研究中心和智囊团研究了解中东地区、中东国家、中东国家之间关系以及重塑中东格局的不稳定发展因素。杨光博士解释说：“我认为中国与阿拉伯是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与中以关系无关。中国和以色列在不同的层面上合作。对中国而言这不是个问题……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不能相互替代。”

恰如中国领导人要求其学术顾问找到新的调查途径，SIGNAL 也首次举办了中以战略安全座谈会。座谈会由赫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IDC）和国际事务全球研究中心（隶属 IDC 的智囊团）共同主办，为中国主要学术顾问提供了充分了解中东地区的理想方法。阿拉伯第一次动乱吸引世界目光后的六个月内，中以两国的专家学者，外交家以及政策顾问悄然出席了这次地缘政策座谈会，旨在就阿拉伯世界的突变交换观点看法。他们了解到，以色列是个稳定的岛国，而地理上与阿拉伯国家的临近，使以色列有机会与阿拉伯各国建立联系但却不会卷入他们的纷争。

“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和平的价值和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意识到了只有和平才能确保各个国家的繁荣发展，”齐前进说。“以色列在推进中东和平稳定的进程中作用重大。因此，中国希望和平的中东经由以色列和各国努力、共同创造。”

以色列正着力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这也间接推动了中以关系的发展进步。中国愈

加关注以色列，原因在于，一方面以色列必须发展技术以保证长久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以色列地处战乱四起之时的稳定要塞。以色列对中国的兴趣源于以色列缺少天然的盟友。因而，以色列对追求建立互利关系的国家是可以接近、非常开放的。

几乎与此同时，其他组织也十分关注中以关系的建立。看着中以关系似乎迎来了密切合作的新时期，这些组织也希望从中获利。美国犹太慈善组织舒斯特曼 (Schusterman) 基金会赞助了两场讨论会，一场在北京大学，另一场在山东大学。讨论会使中国研究以色列、中东及犹太教的学者们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学者进行了交流和互动。2011年，舒斯特曼基金会邀请中国一个由知名学术带头人组成的代表团去往以色列，与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阿拉伯裔的政治及社会领域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会面。以色列计划(TIP)是国际非盈利性的，着眼于全球媒体，提供对中东地区不带偏见的信息，建有中国部，促使以色列及中东的信息传播到中国。学术层面上，众多组织中的另一个非营利组织--以色列-亚洲中心。它以架构以色列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桥梁为目的，帮助外国学生在以色列留学。

中以关系曾是个敏感话题。过去，中国将合作领域限制于科技、科学创新及金融。然而，以色列已逐渐取得公众认可，SIGNAL 举办的研讨会从这个层面看十分有用。因为没有邀请媒体，中以与会人员可以自由表达观点，交流思想，希望以此建立长期互利的思想交流。

长期可持续发展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的影响力显著提高。执政党认识到经济发展是决定国际地位的核心，但更是国内稳定的关键。领导层也意识到，虽然过去三十年里，廉价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在未来几年，它不足以推动国家发展。2010年夏，中国强调经济现代化维护国家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发展目标是使本国由世界工厂变为创新中心。因为以色列的国际知名创新者众多，中国转而把以色列作为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潜在价

值的伙伴。这使中国的认知有了结构性的转变。中国领导人开始把健康稳定的中以关系作为解决最突出的问题的途径之一。领导人认为，以色列以其独特的技术创新可使中国摆脱发展困境。

“如果没有国内市场，也没有像拥有先进科技成果的以色列一样的国外资源，中国的经济也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齐前进说：“中国需要在经贸方面与以色列保持更好的联系。”

中国以空前高成本环境破坏为代价成为工业大国。事实上，中国现今环境严重恶化，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严峻的政治挑战。中国卫生部指出，污染致使癌症成为死亡的主导因素。每年仅空气污染就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另外，近 5 亿人无法获得洁净饮用水，且全国 5.6 亿城市居民中只有百分之一吸入的空气达到欧盟安全指标。在中国迎接可再生能源、节约用水，清洁技术和可持续增长挑战的过程中，以色列地位独特。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速，但是进一步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杨光博士表示，同时强调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基于巨大且密集的资源消耗。“中国需要改变发展模式，创建新的更节约资源的模式……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以色列的经验。以色列在许多领域实力雄厚，如节水灌溉技术和高产农业技术。”

杨光博士强调，中国和以色列目前正就海波发电项目展开合作，寻求化石燃料的替代能源，以此减少对环境的危害。“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使得两国关系更加密切。双边关系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杨光博士指出。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已应对各种因有限的自然资源和众多的政治和地理挑战而产生的困难。以色列沙漠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因而十分重视供水最大化，大量旱地变农业沃土也引起关注。的确，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Ben-Gurion）宣告新时期的主要挑战之一即实现“让沙漠之花绽放”的目标。以色列首任总理认为，这可能是以色列对世界的主要贡献之一。因此，自建国起，国家优先发展节水技术。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高效、最新型供水系统，

为中国解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案。

鉴于以色列受到阿拉伯抵制且自身能源匮乏，至今才有所缓解，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尽可能节约能源，研究新型能源，可替代能源，寻求可持续发展策略。无论是数十年来使用太阳能热动力，还是大力发展特殊生物燃料，以色列不断扭转自然不利因素，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这还巧妙地显示出其在可持续能源领域中的专业技术和知识水平。

以色列人口创新成就显著源于国家对国防建设、水资源及节约能源三方面的需求。以色列与中国一样，最有价值的资产是人力资本。鉴于地缘政治孤立和天然盟友匮乏，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很早就知道不能总是依靠欧洲或美国来获得军事技术。因此，国家和政府不断强调发展教育、科学和技术，以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以色列的国防需求和人民的创新创业精神结合，在节能和节水的各个领域发展专业技术，这些经验可以直接为中国所用来满足发展需要。

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国内稳定。为了确保内部稳定，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提高经济参与度，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

中国旨在促进中东地区经济繁荣，途径是增加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加大投资，以更低价提供工业制成品和施工服务。

另外，为了避免冲突，中国始终谨慎的奉行不干涉原则积极的参与外交活动。中国派出特使，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调停，并配合联合国将维和部队派遣到苏丹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齐前进表示，“中国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支持平等，反对强权政治；坚守原则，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中国倡导对话，反对冲突，同时谨记中东地区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国已做出努力来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国将一如既往，就调停并解决中东地

区的热点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近来，中国的中东政策相对被动。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原则。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在阿以冲突中支持阿拉伯。90年代初，和平进程开始，中国旨在寻求更加平衡的政策，更积极地促进和平进程。叶海林博士解释说：“希望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中国不会对以色列的每项决策都表示认同，但会不遗余力的以惠及以色列的方式促进该地区的稳定。”叶博士强调，中东地区不受任何国家控制。他还补充说，随着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他国家也应在该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另外，“中东地区还存在许多力量博弈，因此看待中东地区不应只通过阿以冲突这一视角……我们需要开拓新视角。”叶海林博士指出。

中国认识到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对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数十年来，美以关系密切主要是得益于对犹太---基督教关系的历史传承以及政治传统。美国犹太族裔（除以色列外最大的犹太人群体）是以色列强有力的支持者。此外，相当多的散居犹太人也在不断支持以色列。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支持深化稳定了美以的联盟关系。中国的移民也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因此，中国政府把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当做一个颇为有趣的范例。

(new passage) 虽然中国没有那么多的犹太人，但是现今中国非常注重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中以两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学术先锋人士都认识到加强彼此信息交流的重要性。目前，可得到的学术资料很有限，大多数的媒体更趋向于关注和以色列有关的战争冲突，因此急需一些可靠的有关以色列的信息

未来交流

中国领导人清醒的认识到，现今中国所拥有的全球影响力比预期计划提早了二十年。但

是目前,要想在下一个十年发挥应有的潜力成为更强大的国家,中国在专业技术方面还缺乏所需广度和深度。

千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第一次同时具备互相匹配的财富和国际视野,它意识到必须努力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力支持中以两国不断增进了解,可以增强中国促进中东地区实现局势稳定的能力,这对中以两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李博士说:“我总是对我们的以色列朋友说,几乎没有中国学者研究以色列,或者完全了解中东地区。”学者间不断的交流包括中国的学者去了解以色列人民并且与他们打成一片,这样才会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某些事物……帮助他们更好地解读某些地区问题……以色列能够不断加强这种交流是非常好的想法。如果更多的中国学者能认识以色列人,了解以色列当地的情况,将十分有助于帮助他们研究中东地区存在的问题。2012年间,学术界掀起了对以色列问题的研究热潮,国越来越有知名学者以及顾问开始与以色列建立友好的关系。

在最近一次访以活动中,国际研究部门代表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主任张蕴岭指出:“以色列的每个人,包括政府和安全专家都开诚布公的与我们进行讨论交流。开展更多这样可以增强我们对以色列战略问题及政策进行了解的会议,可以有助于我们对该地区的稳定作出更好的贡献。”

如上所述,作为中国领导的顾问代表,中国学术界精英不断地利用各种方式,寻求与以色列学术界人士交流讨论的机会。他们逐渐与致力于深化中以关系的以色列机构建立联系,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中以关系促进中国和以色列的经济的长期增长以及地缘政治持久稳定。

“中以双方意识到双边关系的潜力巨大,这体现在政治、社会、文化、科学方面,特别要考虑到的是中国的转型期,机遇是不可估量的。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SIGNAL)在不断加深双边关系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教授在2012年10月访问以色列说到。

张教授和他的四位同事在以色列访问了七天,临别时,他说:“中以双方相互交流的潜

力无穷 ,我们有太多的事可以做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古代文明 ,互相分享音乐、艺术和科学。

无论是中国还是中东地区 ,现在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毋庸置疑我们两国有着很多共同利益 ,个人以及专业层面上的交流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大量的贸易往来 ,高级官员的交流 ,中以双边关系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尽管中国与其最初包括阿拉伯联盟在内的贸易伙伴 ,在过去的十年中 ,关系发展迅速 ,但中以双边贸易的发展却相对平缓。中以贸易的互补性极强 ,这一点在以色列拥有清洁能源技术而中国具备商业化开拓创新的能力上尤为明显。这表明两国合作潜力巨大。若中以两国最大化的进行合作 ,贸易额至少可以翻一番。此外 ,以色列还可以在农业、高科技以及电子产品方面为中国提供帮助。而且中以双方已经在安全和经济规划方面达成合作意向。中以关系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这需要双边耐心去培养

(附言)

很明显 ,在写这篇文章时 ,中国对以色列看法有了轻微的转变。自 2012 年 11 月 14 日开始的“防务之柱”行动是以色列为了应对 Hamas 持续不断的导弹袭击而实施的 ,中国媒体却大篇幅的从阿拉伯的视角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以色列驻中国北京大使馆发布消息称 ,相关媒体报道表明 ,随着美国将关注的重点从中东转向东亚 ,中国开始尝试涉足中东地区 ,对以色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随着中国对中东政治问题的参与度不断提高 ,一些阿拉伯国家对此颇为不满 ,中国似乎对以色列及其好斗的阿拉伯邻国立场更为强硬。中国对阿以冲突所采取的政策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作为影响中东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介入这些问题 ;中国对中东的政策会发生多大程度上的改变多大 ,这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